

臺灣本土近代佛教的歷史變革透視：

日本殖民下的佛教歷史社會基礎（七）

江燦騰

但從九一八「瀋陽事變」（滿州事件）爆發後，第三個轉換期亦跟蹤而至，進入了所謂「法西斯主義」的教科書時期。等到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成功，但隨即捲入最後導致敗戰的「太平洋戰爭」之後，教科書不用說全被軍事化的決戰思想所宰制了¹。

可是臺灣既屬非大和民族的文化生活圈，又驟然之間被列強割讓為異國兼異民族的新殖民地，身為首任來臺學務部長的伊澤修二，又如何將日本國內的教育方針轉移到臺灣這塊新殖民地來呢？例如哲學家井上哲次郎本人後來即坦誠「曾在臺灣擔任過教育工作者，都異口同聲指出：教『教育敕語』是最感頭痛的事，此乃兩民族之歷史迥異之故。教導日本兒童『皇祖皇宗』『一旦緩急，義勇奉公』等即為重要，但教導臺灣兒童則易生誤解。特別是『彰顯爾祖先之遺風』更被誤為本島人之祖先」

²。因此他主張須另頒一適宜殖民地之「新教育敕語」，以切實際需要³。所以伊澤修二的教育方針，究竟當初是如何決定的？有必要略加探討，才能明白。

近人吳文星對伊澤修二「以普及日語教育為中心」的決策淵源，有極精闢扼要的介紹，今先參考其論述要點以作為討論的線索。首先，吳文星認為「（在臺）以日語為中心的殖民教育之展開，實與日本國家主義教育思想和政策有關。明治維新後，日本已由封建的幕府體制一變而為中央集權的近代國家，頒佈統一的學制，進而於1886年確立國家主義教育政策，旨在教育國民維護日本固有的語言、習俗、制度及國體等，以奉戴萬世一系的天皇為最大榮譽和幸福；亦即是以培養國民忠君愛國思想為最終標的，由是而建立近代日本的國民教育制度。首任臺灣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正是國家主義教

育的倡導人之一」，1890年，號召同志，創立『國家教育社』，宣稱該社首要目的在於統一國語，培養國民忠君愛國精神，積極推動『國家教育』運動。⁴甲午戰後，伊藤遂將該社的主張在臺灣附諸實驗⁵。

「伊澤本著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國家有機體說的語言觀，認為臺灣的殖民教育政策適合採用英國在加拿大所採的『混合主義』，使臺灣不只純然是個殖民地，而必須使其真正成為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因此，「伊澤就任學務部長之初，向總督樺山資紀提出的『新領土臺灣之教育方針』中，關於應急事業，首先強調宜講求日、臺語教育，以『打開溝通彼此思想之途』；關於永久事業，則特別重視初等普通教育和師範教育。同時，另於『臺灣學事施設一覽』中，建議訓練熟諳臺語的日人講習及設立國（日）語講習所以應急需，設立國語學校、師範學校以奠定永久事業之基」。亦即伊澤視日語教育是達成同化臺人的主要輔助工具，故伊澤斷然拒絕當時在臺南從事以羅馬字將臺語拼音來佈教的基督教長老教會牧師巴克禮（Thomas Barclay）對其經驗借鏡的建議。

根據「資料顯示，總督府接受伊澤的意見，

乃決定採設立日語學校而漸普及普通教育與尊崇學者的文教方針」⁶。而日人國府種武亦指出：「伊澤所主張的國（日）語，並不只是以國語實施的教育。伊澤並非只是漫然期望臺人透過國語獲得知識，而是熱切地謀求以國語教學而使臺人變成日本人，此乃國家主義教育當然的歸結。」⁷

伊澤修二的教育方向，既是當時臺灣殖民當局所採納的文教政策，日本初期來臺的佛教隨軍佈教師或開教使，不但本身有其必要，更須配合官方的文教政策，故「大日本臺灣佛教會」的〈會則・第11條〉即明白提到：

有關教育子弟事項，在教導臺人子弟學習日語之餘，還應儘量涵養其尊皇奉佛的思想。⁷

在同《教報》第一號中，也報導說：「日本語學校——宛若在（明治）開國的教育中，著先鞭的（日）語學普及教育，在臺灣地區成為日本領土之後，（日）語學校的設立，亦如雨後春筍般的陸續興起，實大可慶賀的盛事！我『（大日本臺灣）佛教會』附屬的（日）語學校，如今學員亦達30名以上⁸。爾後本會將更增大規模，以薰陶臺灣地區民眾的子弟為務。」以及「各宗派設立的（日）語學校，有二處在臺南、有三處在關廟。而真宗設立

的日本語學校，據說有學員四、五十人。並且，臺南城內萬福庵內亦有曹洞宗設立的日本語學校。此外，臺北艋舺天后宮內，『臺灣佛教會』也與曹洞宗佈教師協議，將開設日本語學校。」可見，這是在教育制度尚在草創時，日本佛教各宗派來臺僧侶所能參與的教育內容。

然而，後來在「臺灣教育會」所編纂的《臺灣教育沿革誌》，雖亦在「第一期臺灣教育令發布前（自明治28年至大正8年3月）」提到有「從軍佈教師」參與日本語學校或明治語學校的設置，但草案以「未滿十指的程度」一語帶過。⁹換言之，其真正本意，是在暗示日僧的日語學校並無多大作用之意！

但，這在官方的角度來看，不足為奇。事實上，在《臺灣教育沿革誌》的〈第二篇學事行政〉中，即列有伊澤修二在抵臺之初（1935年6月17日與首任代理民政局長水野遵共同在臺北城參與始政慶典，4日後出任代理學務部長），立即向首任總督樺山建言：

由於言語不通，致使文武官吏的不便之感，出乎意外的強烈，雖有陸軍通譯百數十名，一旦要詢問臺北地方的本地人時，仍有幾經翻譯，還搞不

懂對方說啥的情形。更何況像憲兵和警官，只有少數脫離本業來從事通譯的工作，因此不可能要彼等能一一擔起翻譯事項。而假使要令其以官語直接與此地臺民來溝通，也一樣有不便之處，並且很可能隨時有遭遇不測之虞。¹⁰

所以伊澤修二在呈給樺木總督的學部事務說明書中，針對新領地的教育方針，他認為大體應分：（一）當下急需的相關事項和（二）永遠的教育事項兩途。

然因其中第二類有關「永遠的教育事項」，本章之前所引吳文星的著作，已說得相當的清楚，故此處僅就被吳文星過度簡化的第一類部份，重新回到原貌來討論。此因吳文星雖曾提及伊澤修二，一關於應急事業，首先強調宜講求日、臺語教育，以『打開溝通彼此思想之途』，但事實上這仍只是原第一類四大項中的首項罷了，其他三大項則完全被忽略了。

試想伊澤修二既然要「打開溝通彼此思想之途」，怎麼可能純靠語言溝通，而不涉及其他方面呢？茲將其他三大項全文翻譯如下，以方便底下的接續討論。而原伊澤修二所提到的是：

.....

二、欲使一般民眾知道所以尊文教的主意，須採下列事項：

(甲) 待新領地的秩序稍一穩定，即諭示官方所以尊文教的主意。

(乙) 不但須注意保持文廟等（地方的）神聖性，且須尊崇之。

(丙) 原支那歷朝所採用的科舉考試之法，不只不可破壞，還須更加利用，例如要任用新領地的民眾為下層官員時，即可在考試科目中加上日語初階之類的（考題）。

三、宗教與教育的關係事項，須慎重處理。

(甲) 對於耶穌教宣教師的處理方法，必不可犯錯。

(乙) 從日本所派來的各宗佈教師，須讓彼等在適當的範圍內布教。

為達上述兩項之目的，在與宣教師及佈教師打交道時，一定得小心，並且要常常到教堂、寺院等處所去巡視和探詢。而此類人員須派能通英、法語，且具有關於神、佛兩教方面的知識者前往。

四、須對人情及風俗的事項進行視察。

教育一事，是自人心根底來醇化者，故須考察與各種社會有根深蒂固關連的人情及風俗，以及據以講求適應之道的教育之法。因此，當局者在始政初期，尤須留意此方面的視察事宜。¹¹

由此內容，可以了解：

(一) 日本官方從一開始，就謹防來臺佈教日僧與在臺西洋宣教師的行為越軌，但提醒須不犯程序失誤，以落人口實。

(二) 有關宗教與教育的問題，亦要求謹慎處理，絲毫不敢放鬆。

(三) 對臺灣舊慣的社會人情世故，從初期就力求理解和尋求適應之途。而也唯有包括這些內容，初期整體的教育構想，才可以看到與後來發展的脈絡之間的相關性。例如兒玉源太郎時期，後藤新平的所謂「教育無方針主義」，其實就是以「普及日語為中心的主義」；而所謂「政治、行政的生物學基礎」，就是以「對臺灣舊慣等社會關連的調查理解為基礎」的。因而，「宗教」事務，很清楚地已被排除於官方正規的教育體制之外。但，對此不利情況的發展趨勢，日本佛教各宗的來臺僧侶，又將如何應付呢？

以當時活動力最強、掌握最多臺人寺廟與其私

下簽約日本曹洞宗來說，在《教報》第一號中，除上述提到（一）用佛教刊物的輿論竭力訴求官方同情，以及（二）辦日語班教臺人子弟來配合官方教育政策之外，還提到下列的記載：

曹洞宗：自去年（1895）6月以來，已派佈教師在臺北、臺南等地進行佈教。本年元月，更派出七名佈教師駐在臺北、臺南、臺中地區傳道的結果，與本地的臺人寺廟簽下誓約，作為宗下的下游寺院（末寺）者，如今幾已遍及全島，並且各寺廟中皆安置了我至尊（按：即明治天皇）的尊牌（書有現任天皇名號的精美木雕牌位，亦稱「萬壽尊牌」），以供朝夕祈念聖壽萬歲！¹²

換言之，當時所謂「尊皇奉佛」的最典型作法，就是將當今天皇的生基萬壽牌，安置在該宗所大量私下收編的臺人原有寺廟中，以示「國體皇道」已透過此類安排，讓其穩固在被殖民者的宗教崇拜場所中¹³。同時，此舉似乎也意味著要求官方，亦必須對此安排予以尊重和許可其作法才對。

但，這種挾帶的花招，難道真能產生預期的作用？恐怕未必！否則也不會招來樺山總督要求彼等須安份為國效勞、不得有非份之想的嚴詞警誡了¹⁴。

同時，樺山總督也坦白說：「現在的情況是，自日本移住之人民，藉此使臺灣人民日本化並不容易，（彼等似乎只）寧願參拜來自日本的高僧，（故今後）如要治理人民，必得自此著手。」¹⁵此因有不少來臺的日僧，並不專注於弘揚佛法的績效，反而有許多品德不佳的表現，故也招致臺人的厭惡與反感，甚至導致原已擁有的信徒大量流失¹⁶。

幸好，日曹洞宗的來臺佈教師有諸如長田觀禪（於臺中教區）、陸鉞巖（於臺南教區）等人，行為端正、熱心弘法，甚獲臺人景仰與親近，堪稱「來自日本的高僧」，故佈教績效極佳¹⁷。這也是日本曹洞宗的教勢，所以能在初期一支獨秀的重大原因之一。

不過，因官方的殖民教育方針早已確定，故大勢所趨，日僧的在臺佈教前景，就初期來看，依然是否樂觀的！（未完待續）

註釋

1. 許佩賢，〈塑造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1984，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30-31。
2. 此段文字，原出處為井上哲次郎，〈殖民地に新敷語賜うべしし〉，《教育時論》第12275號，1919。而由歐用生首先引用於氏撰〈日據時代臺灣公學校課程之研究〉，《臺南師專學報》第12期，1997。頁101。
3. 同註1。頁36。
4. 向山寬夫亦提供了另一角度的觀察，他說：「日本自領有之初，即對臺灣人採取施行教育之方針，為此，樺山總督在上任之初，任命以一流教育家聞名於日本、曾留學美國對中文教育別具創意、後者著『中國語正音發音』，自創一種中國白話文字的伊澤修二，為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心得（代理），以應急設施與恆久設施之分的學制意見，著手臺灣人的教育。領有當初，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多半是課，但有關學務的部局，卻和總務、財務、法務、通訊、土木的部局一樣是部，據說這是重視儒教教育、考慮到統治新附之民臺灣人的明治天皇的想法。」見氏著、楊鴻儒等譯，《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福祿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167-168。
5.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308-309。
6. 同上註。頁309。在同頁中，吳文星又同時提到：「復次，自德川幕府末年以降，日本即每以日語作為侵略和統治的手段，先後對蝦夷人和琉球人實施學習日語的同化教育，並已獲致相當成效。另一方面，明治初年，福澤諭吉即有移植文明語的日語及日本文化以『開發韓國』之主張。其後，在逐漸形成的『進步的日語』、『落後的亞洲』意識作祟下，日人遂產生對『落後的』亞洲民族強制實施日語可使其開化之觀念，而有『近代化的日語論』之提出。據有臺灣之後，此一『近代化的日語論』進而轉化為『同化的日語論』，認為
7. 鹿山豐編，《教報》第一號，頁42。
8. 臺灣佛教會附屬的日語臺籍學員，共分甲、乙兩部。甲部臺籍學員有：林友松、胡呈輝、林宗徐、邱紅地、陳襟三、陳老來、楊振茂、陳益川、張茂林、胡清秀、王必明、柯鑑唐。乙部臺籍學員有：李水、蔡慶、洪必榮、許成金、李勝、鄭璉、林天回、許美玉、張塗、林天福、蔡如玉、周登科、黃阿三、李清海、吳和。同上註。頁46。
9. 北原雄土、三屋靜、加藤春城等編纂，《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25）。頁2。
10. 同上註。頁6。
11. 同上註。頁7-8。
12. 鹿山豐編，《教報》第一號。頁41。
13. 以後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也比照辦理，詳後文討論。
14. 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頁96-97。轉採松金公正之譯文，〈日本殖民統治初期佈教使眼中之臺灣佛教——以佐佐木珍龍的《從軍夢遊談》為中心〉，頁30。
15. 同上註。頁98。轉採松金公正之譯文，〈日本殖民統治初期佈教使眼中之臺灣佛教——以佐佐木珍龍的《從軍夢遊談》為中心〉，頁30。
16. 溫國良，〈日據初期日本宗教在臺布教概況——以總督府民政部調查為中心〉，發表於「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專題研究成果研討會」，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8.11.26。頁15。
17. 同上註。頁8-9。